1. 日本文化之谜

日本文化之“谜”，不仅仅因为在东西方文化中，它不能简单地归属于任何一方，而且因为它本身蕴涵着一种惊人的复活与再生的巨大能量。这种巨能，竟然使日本人战胜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和军国主义者铸成的民族灾难，并在短短的历史瞬间，在战败国的一片瓦砾堆上，重建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世界经济强国。而世界各国对日本文化的兴趣，也与日本经济发展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正比例地增长着。

1.1.医治战争创伤的灵药

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时的日本，除去盟军特殊照顾而使日本文化的摇篮京都免遭战火之外，几乎所有的大小城市，都被美国的轰炸机摧毁成一片废墟，不管走到哪里，视野所及全是断垣残壁和冒烟的焦土。偶而能瞥见几个孤零零地横竖在废墟之中的被烧得变了形的保险柜，令人联想起昔日里那些商号老板忙忙碌碌操持家业的情景，却又不由得使人感到凄惨、抑郁，甚至毛骨悚然。

有人统计，就在这场战争中，大约有一百八十五万日本人丧生，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无辜百姓，他们大都死于美军燃烧弹的狂轰滥炸。燃烧弹的威力，直接摧毁了日本城市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赖以从事生产的各种设备被破坏，城市人口流离失所、妻离子散，逃向全国各地。战争罪魁军国政府的失败，使日本民族进入空前屈

辱的时期，饱尝着战祸的苦果，生活变得日益艰难。一切消费品都已耗尽，食物奇缺。城市居民为了活命，不得不到黑市上去搜索东西，其结果是道德沦丧，历来谨小慎微、奉公守法的人们，变得习惯于在小事情上违法乱纪。占领军士兵手中的食品，可以换取包括少女贞操在内的一切东西。战争在日本人心灵上留下的创伤更为痛楚，伤口上流淌着烫手的热血……

然而，是什么神奇的“灵药”那么迅速地治愈了战争的创伤？

短短的二十余年，日本经济发展出现了奇迹，而且它的发展势头经受了种种冲击和考验。到六十年代，日本人就觉得自己已经富裕起来了。这个国家的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6%，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1.3%，先后超过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今天的日本，在汽车生产方面凌驾于其他国家无法接近的美国之上，钢铁生产方面击败了美国，并且向全世界供应着如同洪水一般的物美价廉的消费品。

日本人的富裕程度，似乎还可以从拥有的家用电器设备中看出来。1981年，日本人使用的彩色电视机已达到人均1.422台，百分之九十五

以上的家庭都有电冰箱、洗衣机、电动吸尘器和电饭锅，空调机和电子烤箱也即将普及。日本人为国家的兴旺感到骄傲，甚至在东京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大阪的世界博览会上，他们也要以自我满足的心情，向外国人夸耀自己的国家，而这种洋洋自得的气氛是他们往昔未曾有过的。

特别令西方人羡慕的是，日本的工业化程度虽高，但在防止公害、改善环境方面的成果却颇引人注目。今天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男子达到七十四岁，女子达到七十九岁，跃居世界之冠。而且，日本的犯罪率还不及西方国家的一半，基本上没有吸毒现象。

对于日本经济发达的文化溯源，人们发表了种种不乏真知灼见的见解，给人以启迪。

有人从自然地理环境上找原因，认为日本人具有一种“台风心理状态”，这种心态内含着宿命论与战胜命运的双重性格。日本气候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每年夏末初秋多有台风的频繁袭击；台风已使日本人习惯于忍受自然灾难，并能泰然处之。他们把这种听天由命的思想称之为“台风心理状态”，并认为日本山脉活火山爆发和日本列岛“每隔六十年一次”的破坏性地震，也助长了这种宿命论观点。在他们看来，日本人有承认自然界

可怕威力的宿命论思想，但与此同时，也锻炼出了在灾难以后重新开始奋发图强的巨大能力。这种观点的社会生物学倾向十分明显，然而却无法解释众多自然灾害严重的国家和地区与日本民族之间的显著差异。

也有人从人种学的角度找原因，认为日本人的种族构成是奠定日本文化的自然条件，日本人的脸型是多种多样的，这说明过去曾经有过长期的、无记载的混合血统。而混血的人种特征之一是善于模仿，因此日本人能够模仿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的发明技术，这种模仿的技能竟然能达到维妙维肖的地步，以致于日本人不必绞尽脑汁致力于创造和发明，仅靠模仿就能后来居上。这种观点的背后隐含着故意贬低日本人的创造才能的倾向，同时还残留着一点忧患和被超越的苦衷。其实，“模仿”论仅是一种假象。从历史上看，日本人在文化上一向是独具一格的。即使在今天，日本也不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日本应有自己独特的地位。

对日本经济发达原因的另一种解释是，日本人是具有高度组织效率的、为自身利益而不惜牺牲他人的、极端残忍的“经济动物”。这种观点似乎更加偏颇。不可否认，在历史巨变的转折关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激烈甚至残酷的经济竞争中，可能出现一些唯利是图、缺乏人性的个人，这在其他民族的发展中也不乏先例，何况日本。然而，一亿一千五百万左右的日本人，虽同属于同一民族的同一文化，但其中不同的个人所持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迥然有别、互相矛盾、极为复杂，不可同日而语，并非“经济动物”所能概括的。

上述观点各执一端，虽不乏独到之处，却无助于解开日本文化之“谜”。要探寻这一问题的底蕴，必须历史地、系统地分析研究日本文化的演化过程；而了解日本文化研究的现状，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1.2.日本文化研究的现状

近年来，世界各国众多的日本文化的研究者，因动机不同，研究的视角和兴奋点也大不一样。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了解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东方国家日本如何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急于了解日本可怕的竞争

力究竟源于何处。最有代表性和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著作，大都出自美国的学者专家之手，其中包括埃德温·赖肖尔的《日本人》、埃兹拉·沃格尔《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威廉·大内的《Z理论》、弗兰克·吉布尼的《新资本主义时代》、罗伯特·库里斯特发《日本精神与风习》以及《时代周刊》的日本特集。

长期以来，依赖大规模世界贸易维持生存的日本人，眼睛总是盯着外国，对外国的一切长处都贪婪地吸收。如今，日本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欧美发达国家不再是它仿效的榜样，一下子从世界的边缘转变为世界注目的中心。由于一时无法适应这一转变，所以，日本人对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对自己民族的特性，在思想上也感到极为迷惘；同时，外国研究者关于“经济动物”的谑称，更使日本人感到难堪。为了改变自己的文化形象，最近几年日本越来越强调“文化立国”的方针。

在这一文化“大气候”下，日本的学者名流于1986年3月正式提出，在日本文化名城京都建立“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建议。这一建议立即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并决定拨款筹建。该研究中心的使命是，把具有国际眼光的日本文化研究

人员组织起来，打破旧框框，从新的角度对日本文化展开国际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这一建议的基本思想认为，只有增强日本文化的鲜明性，并将取得的研究成果提供给各国的日本文化研究人员，加深各国对日本的理解，才能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对外政策，从而消除种种摩擦和紧张气氛，实现与各国的和平共处。

日本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筹备室主任梅原猛，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研究课题的方案，其中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在日本文化的历史与理论方面，有日本人起源及形成过程的研究；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地区性研究；绳文型文化和弥生型文化的构思；对深层日本文化研究的展望；日本文化的美学构思；“锁国”和“开国”的文化动力学；日本的传统心理研究；日本的感性和美学思想；日本的礼仪思想；日本人通过文武技艺的自我修炼；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和自他关系；日本的精英思想文化、民众文化、宫廷文化、武士文化和知识分子文化；日本人的人际关系；日本人的宗教观等等。

在文化比较和文化交流研究方面，有东亚、太平洋地区人群及文化迁移研究；东、西文化史观的构思；外国文化摄取类型率；大陆、半岛和

岛国文化意识的比较研究；对外来思想的吸收与创造；对日本人的神仙观、灵魂观的比较研究；对日本人人生观的比较文化论研究；对日本人的自然观的比较文化论研究；关于“和平”的比较文化研究；关于“一种外国文化理论”的构思等等。

所有这些研究课题，表明了日本学者的雄心和胆魄，反映了日本人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的反省意识和自信心。由于世界各国文化研究者的关心和支持，由于日本政府的积极赞助，国际性日本文化研究的活动可望顺利开展。这一研究活动的深入拓展，是与世界各国对东方文明的了解和理解的进程同步的，是东西方文化进一步交流、认同和融合的历史潮流。

一些长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往事业的日本方面的有识之士，多次指出，单是日本文化还不足以代表东方文明，还不能提供西方文明所欠缺的全面的有效的帮助。只有中国文化的介入，才能共同完成重建东方文明的任务。确实，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唇齿相依，互相影响，互相切磋，也经历了一些曲折、碰撞和冲突。由于历史上长时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交往关系，致使中日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在一些文化现象上甚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彼此界限模糊，“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一显著特点，决定着研究日本文化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背景的重要性，决定着中日文化交流史对于日本文化史的重要性。因此，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潮流中，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又反过来加深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省和理解，从而提供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有益的启迪。

2. 古代的嫁接

日本文化的变异性特质，早在古代就已经显现出来。它经过“嫁接”，逐步形成了混合性和综合性的文化结构，其中包容着宗教、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语言上多元文化体系，为以后的各种发展可能性提供了充分选择的余地，也为日本文化得以叩响近代历史的大门打下了基础。

2.1.归化人的功绩

有关日本民族的来源，流传着种种古老而美丽的传说。

在日本古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记载着“神武开国传说”，壮丽神奇，扣人心弦。

传说天地形成之后，出现了七代天神。自丰云野尊以上是单身，称为“独化之神”。自宇比迟尔尊、须比知尔尊以下，皆阴阳二神对生而为一代，称为“耦生之神”。

第七代天神伊奘诺尊、伊奘冉尊原居高天原，奉诸神之命，立于天浮桥上，以天琼矛下探沧海，矛锋滴水凝结为岛屿，于是二神便降临岛上，造八寻殿而居，开始行夫妻之道，陆续生出日本大八洲、岛屿山川及草木。二位尊神思量：“既然已生大八洲及山川草木，为什么不生天下之主呢？”于是就生下日神，号称大日灵尊，也称天照大神。接着生月读尊、素戋鸣尊、火神轲遇突智、金神金山彦、土神植山姬、水神冈象女等。

后来，狂暴残忍的素笺鸣尊不安守其职，前往高天原，与姊天照大神成婚，而生五男神和三女神。他在高天原又重演暴行，妨害天照大神的农事，于是，天照大神大怒，逃入天石窟中深居不出。因此，天昏地暗，灾异迭起。高天原诸神便设计议迎大神出窟。果然，天照大神被洞外喧嚣的狂歌热舞声所吸引，刚开户隙窥视，突被一有蛮力的男神强开门户，拥出入宫。于是，天地重光，灾异立息。这才有赐镜、剑、玉之神器，天孙降临的神话。

在中国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一个关于日本民族来源的美妙的历史传说，这就是“徐福东渡传说”。

据说，古代中国人面对着东海遥远而又飘渺的海市蜃楼，生出无限奇妙的幻怪神话。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州三座神山，是仙人居住的地方，长有长生不老的仙药。这一“蓬莱仙境”的美丽幻想，甚至迷惑了希冀“万寿无疆”的秦始皇，他派遣山东人徐福（芾）率领童男童女三千人及五谷种子、各种工人，入海求仙。可是，三座神山相传在海中离人境不远，可若要接近，风就把船吹走。徐福求仙药不成，又惧怕秦始皇砍头，于是率众在纪伊熊野浦（即现今日本和歌山县新

宫市）登陆。登陆之后，就教导当地百姓耕田捕鲸，发展生产，安居乐业，受到人们的尊敬。他死后，当地人民为纪念他，在新宫修建墓地，墓前建一石碑，刻“秦徐福之墓”五字，为李梅溪手笔。后又为徐福立祠，今称徐福神社，专门祭祀他及其随从，每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是他的祭日。

更为有意思的是，近年来日本学术界，关于神武天皇是否就是徐福的争论还时有发生。在中国江苏省赣榆县城北金山乡南一公里处，最近发现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徐福东渡传说”，把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联系具体化和现实化了。

不管徐福东渡是否确有其人其事，这一历史悬案可由历史学家继续考证研究，但是，这个传说的深层结构有两点是无法否认的，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和“秦汉归化人”的历史功绩。

由中日两国学者的诸多研究成果证实，公元前三世纪至二世纪，日本从绳文式文化向使用金属工具和种植水稻的弥生式文化转变时，中国的青铜文化和种植水稻、养蚕技术，都沿朝鲜半岛西岸的乐浪郡这条东方“丝绸之路”传入日本群

岛。至于横越海流急速的对马海峡，在当时的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阶段并非易事，可能是经过对马和壹岐以抵北九州沿岸，也可能凭借天然海流，漂流到本州北岸地区，由此造成弥生时代不同特征的两大先进文化圈。

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南下，从朝鲜半岛移居日本群岛的中国人，在日本史书中被称为“秦汉归化人”。他们是中日文化交流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据日本天皇政府编纂的史料记载，归化人约占日本全部姓氏的百分之三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汉族人。所以，正如一位日本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我们现代的每一个日本人，都继承着一千数百年前生活着的全部日本人的血液，所以，必须承认，我们不论谁的血液中，都含有百分之十或二十古代归化人的血液。虽然流行着我们的祖先同化了归化人的说法，但并非如此，归化人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是为了日本人才做的，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日本人在做工作。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由于天灾、战祸影响，原居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逐渐向江南、东北等地区移居。晋武帝死后，晋朝的内乱从宫内后党演变成全国性的八王之乱。由于八王混战，黄河流域人民不堪忍受战乱、饥饿，纷纷移徙寻

求生路。其中的一部分流民群移居东北边区，又进入乐浪、带方二郡。后来乐浪、带方二郡也卷入战争漩涡，他们又被迫迁徙到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和新罗等地。当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之间爆发战争时，这些汉族居民中有一部分人就渡海迁移到日本群岛。对于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初汉族人民大量迁徙日本群岛一事，日本史书称之为“归化人”进入日本群岛的第一次高潮。

后来，当匈奴族刘聪杀晋怀帝，推翻西晋政权之后，黄河流域群雄蜂起，交替建立十六个政权，混乱局面长达一百五十余年。一部分居民避走边区，由此形成五世纪末“归化人”进入日本群岛的第二次高潮。

所有这些来自朝鲜半岛的汉族“归化人”，都常常自称为秦始皇或汉高祖的后裔。其实，真正的秦皇汉武的血统后裔为数极少，重要的是秦、汉、吴、晋代表着他们的祖国。其中有些定居朝鲜半岛时间很长的汉族人，在传播汉文化的同时，又和当地居民共同创造了半岛文化，可是沉淀在他们心底的种族意识和思想情感，仍使自己认为是汉族人。甚至在许多年后，有些已经成为道地的日本群岛居民之后，他们仍这样认为，可见“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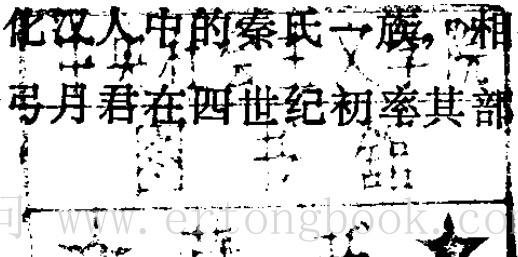
根意愿”之强烈，种族心理是不会轻易泯灭的。

《日本书纪》中记载，倭王曾直接向南宋皇帝要求支援工匠，并且还通过百济招聘中国的工匠。这些能工巧匠应招来日后，倭王建立起陶部、鞍部、画部、锦部、翻译部等各种工匠部。为同先前来日的秦汉归化人相区别，日本史书把这些从百济招聘的汉族归化人称为“新汉人”。

进入日本群岛的秦汉归化人和新汉人，给日本人民带去了汉文字、经典古籍、农耕、养蚕、丝织、土木工程、冶铁锻铁以及雕刻、绘画、织物、刺绣等各种生产技术，在这层意义上，他们无愧于中国文化传播者的称号。

据说归化汉人的一支大姓是西文首氏，这一族的归化汉人有不少知识分子，大都在倭王政府中从事文笔工作。携带《论语》和《千字文》应召聘来日本的王仁，后来就成为西文首的首领。他们承担政府中各种帐目记录的整理、外事往来文件的起草和翻译工作。由于倭王政府的外事活动主要是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外交往来，都需要使用汉文，因而西文首一族中的一些人家，成为“外交世家”。

归化汉人中的秦氏一族，相传是自称为秦皇后裔的弓月君在四世纪初率其部民一百二十七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